

牡丹社英魂長存

台胞首次抗日事件

● 王志恒 (前高雄縣縣議員，著有榕窗文集、萍蹤散記等書)

台胞抗日始於同治

說起台胞抗日，多指甲午戰後的日據初期，其實首次台胞抗日事件，還要再前溯廿餘年，即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南台灣四重溪上游的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的肇因，是當地原住民同胞殺死六十餘名漂流而來的琉球人所致，琉球本中國屬地，琉球人被殺，照理應是中國內部的治安事件，日本人干預，是「狗拿耗子」。

不過當時的情勢複雜，即琉球雖名屬中國領地，實已遭日本強佔。而北京的清廷闖弱無能，無力照顧屬地，眼睜睜的看著該地被強鄰攫奪，不敢多置一辭。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增強，極思對外擴張，琉球在日本南方，首當其衝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日本以蠻橫的外交手段，強迫清廷讓出琉球的宗主權，清廷審時度勢，自感無力保護琉球，乃默認琉球與中國脫離關係。但琉球人仍心向中國，不承認日本人強改的「沖繩縣」名稱，甚而直到戰後的一九七四年，美國政府基於自身的利益強把琉球交給日本，卻仍有部分琉球人自認為中國人，保有漢姓、漢名及漢人的文化認同。

言語不通引發衝突

以此情形，把琉球視作日本人，實在太過勉強。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兩艘大型琉球帆船，由宮古島及八重山島的居民駕駛，滿載貨物駛向日本，事畢返航，不料中途遭颶風吹襲，宮古島民的一艘船漂流至南台灣滿洲鄉附近的八瑤灣，

即今日的高士佛港外，因風強浪急，帆船觸礁，全船六十九人，三人溺斃，尚有六十六人，但已桅折船傾，求救無門，只好冒險棄船上岸。遇到原住民排灣族同胞，言語不通，加之琉球人態度欠佳，引發衝突，遭原住民追殺，釀成流血事件。

事件發生在四重溪的石門，世為排灣族群居地，為牡丹社、高士滑社及女仍社，民性素以強悍著稱。而石門兩山對峙，峭壁夾溪，形勢險要，易守難攻。琉球人與排灣族人遭遇不久，即被排灣人持刀集體追殺，殺得琉球人四散奔逃，其中兩人由平日和排灣人有生意往來的漢人劉天保救起，夥同廣東籍陸姓老人，將兩人帶至車城以南堡力莊七十餘歲的老莊主楊友旺處，楊友旺除收留兩人外，並命其子阿吉和阿和隨同劉天保去營救其餘的人，途中

遇到九人正被追殺，楊友旺以番洋四十九枚、布六匹、水牛一頭、豬數頭換救。另有一人逃至高士滑社，亦為楊友旺用酒肉換救。楊氏父子合計營救了十二人；其餘五十四人全被殺死。生還之十二人在楊友旺家中住了四十餘日，於十二月十二日被送至車城，再乘船經楓港至枋寮，轉鳳山到左營，因當時鳳山縣署已遷至左營。

鳳山知縣孫繼祖對楊友旺的義行備加稱頌，償銀若干兩。隨即將十二人送至台南府城，再轉送福州，經閩浙總督文煜，優於慰撫後送返琉球。其餘五十四名被敵首的屍體，由楊友旺收拾埋葬於雙溪口附近。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台灣府轉呈申請褒獎楊友旺，經清政府授以六品功牌乙座。

鷹派獲勝與師問罪

生還的十二名琉球人回日後，向鹿兒島縣當局報告，備述遇險經過，鹿兒島參事大山綱良，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報告。日本主政者力主「興師問罪」，但分為兩派，反對派認為清政府武備仍有相當實力，日本尙在政治維新初期，國力未豐，一旦

向台灣出兵，引起戰爭，勝算難卜，而且還要耽心國際干涉。但強硬派堅持出兵。以山縣有朋、大久保利通及大隈重信等人主張最烈。

最後，強硬派得勢，乃於同治十二年三月九日，派遣外務卿副島種臣由副使柳原前光陪同，赴北京向清廷交涉。於六月十日向清總理衙門提出抗議文書。總理衙門答以「琉球台灣俱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等語。

副島種臣一時辭窮，鐵羽而歸，日本老羞成怒。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四月五日發兵侵台。在日本長崎成立「台灣蕃地事務局」，強硬派要角大隈重信任該局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於四月八日自東京出發，到長崎碇泊待命。不久，率艦隊出發，於五月七日，到達恆春外海，次日黎明日軍便在距恆春東北方七公里之瑯璁（今恆春）社寮莊登陸。五月十日登陸完畢，紮營於後灣之龜山。司令官西鄉於十九日乘新由英國購買的「得爾他」號，後改為「高砂」號旗艦抵達瑯璁營地。

長驅直入燒殺掠奪

此時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率領排灣族原住同胞丁勇三百餘人，憑石門天險沉著拒守。二十二日接敵，展開戰鬥。原住民扼住地理險要，英勇抵抗。日軍自山下仰攻，情勢不利；後來日軍由佐久間中校率領兩個排，迂迴到山後繞攀而上，登上絕頂與戍守的排灣族同胞發生白刃戰。酣鬥約一時許，原住民失去地利，終於戰敗。而帶頭抗日的阿祿父子光榮戰死。餘眾因首領陣亡乃作鳥獸散。

戰役中，排灣同胞傷亡三十人。日軍死十二人傷十七人。原住民同胞戰敗後，門戶洞開，日軍長驅直入，於六月三日進佔牡丹社、高士滑社及女仍社，燒殺掠奪，殘暴無比，將三社燒燬，社民全部逃匿山中。

然而日本對牡丹社軍事行動後，仍不撤軍。清政府遂對台積極作軍事部署。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調淮軍中最精銳新軍「武毅銘」軍萬餘人來台。沈葆楨到台後，立即建築安平、高雄、東港等地要塞砲台，按裝大砲，調兵佈防，雙方對峙，劍拔弩張，戰火一觸即發。

騎虎難下自找台階

此時，日本一面以留台軍隊作恫嚇姿態外，一面派柳原前光為特使，攜同住在日本長崎的鄭成功之弟七左衛門的第八代裔孫鄭永寧赴北京交涉，因鄭永寧精通漢語，以其任談判翻譯。談判開始後，清廷代表直隸總督李鴻章指摘日使柳原說：「你們不該派兵到台灣，又未事先照會中國，既然發兵又要和好，口說和好卻不做和好之事……」。把日本侵略本質一語道破，談判不歡而散，後來日本又派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到北京交涉。

台胞首次抗日事件

這時，客觀條件對日本不利，政治維新才起步，革新制度初創，財政困難，無法支應龐大軍費。而且在台日軍因水土不服，死亡相繼。而中國在台亦積極備戰，再戰必定慘敗。大局使日本情勢如騎虎，窘態畢露，強硬派遭到強烈責難，不得已以「要無賴」的做法，軟化口氣自找下台階，於是大久保利通說：「日本不能徒勞無功」。「必須有名目才能退兵」。經過七次會談，日本提出兩百萬兩白銀的軍費賠償。清政府僅允給被害者「酌量恤撫」。後來由英國公使威妥瑪（T.F. Wade）及美國公使艾作敏（B.P. Arey）居中調停，

於十月三十一日，以賠償五十萬兩白銀達成協議。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軍由台灣全面撤退。

惡性瘧病傷亡慘重

此次侵台日本總動員兵力共有三千六百五十八人。軍屬一百七十二人。從僕六十三人。真正的戰鬥兵，為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軍艦五艘。補給艦二艘。運輸艦四艘。當時台灣衛生狀況欠佳，有「瘴癘島」之稱。是年八月起。日軍多患惡性瘧疾。病勢兇猛，每日死亡人數由四、五十人至上百人之多。

據當時隨軍翻譯，後任正式據台首任台灣總督府的民政局長水野遵所撰「征台私記」上記載：「二千五百人中，能進食米食者，僅十五、六人而已。其餘僅能進食稀飯米湯……」。後日人正式發布在台病死者五百六十一人。佔全軍人數的五分之一強。後來沈葆楨於日軍撤退後，視察瑯瑤（恆春）準備築城設縣的奏章中也有提及：「車城外西北地曰後灣者，倭人舊營地之址也。濱海當風，水土又惡，當時彼族居之，病亡相繼……」。足證日軍當時病亡之慘重實情。

撤退曉諭滿紙恫嚇

又據日本公布的資料，日本此次出兵台灣，前後七個月，兵員損失已如上述。而用去的軍費，計有三百六十一萬八千零五十九日圓。同時爲了侵台新購艦船七艘。租用的四艘。耗費七百七十一萬餘日圓之鉅。加上實用軍費合當時日幣一千一百三十餘萬圓。而中國所賠償的五十萬兩白銀，折合當時日幣也不過七十八萬日圓。日本可說損失慘重。

侵台日軍司令官西鄉從道臨撤退前夕的十一月二十日發布一道向原住民的「曉諭」。滿紙恫嚇。此一曉諭會藏在當時豬勝東社頭目潘文杰家中。於日本正式據台後，索回存放於台北博物館內。另外大久保利通還寫了一首似通非通的漢詩，流露著趾高氣揚的姿態，詩云：

王師一到磴頑兇，猊貅三千兵氣雄；
請見皇威覃異域，石門堡上旭旗紅。

西鄉從道又在撤軍前，把死亡的琉球人由雙溪口改葬統領埔。並立一石碣，題云：「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這是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同胞英勇抗日的史詩，也是日本侵我中華的國恥之始。